

申小龙 著

中國語言的結構 與 人文精神

文字與文化叢書專著(三)

曉園語文與文化科技研究所
漢字現代化研究會

編 袁曉園主編

光明日報出版社

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

——申小龙论文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
《文字与文化》丛书个人专著（三）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0.2）（270）千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1—3600册 定价：3.68元

ISBN 7—80014—224—8

H·0004

序

张世禄

早在小龙读完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就曾建议他将数年中发表的那些卓然自成一家言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在小龙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中，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术论文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与赞誉，多次荣获学术奖。最近，小龙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后，终于有时间腾出手来整理自己的学术论文，交付出版。作为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导师，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小龙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并对语言学理论有浓厚的兴趣。本科毕业后，他却报考了我招收的汉语史研究生，从此开始了对《左传》语法的研究。他依靠自己在古文和外文方面的扎实底子，以穷尽性的语言材料分析为基础，借鉴了国内外各种句型理论，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语文传统的新角度对汉语语法的特点作了大胆而又深入的探讨，从而在语法研究上独树一帜。小龙又把这种探讨与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的反思与展望结合起来，最终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语言学，显示出年青一代极其可贵的历史责任感。由于小龙的论文开辟了汉语与中国文化相关性研究的新领域，其意义已超出了纯语言学的范围，成为中国文化与人类文化研究的独具魅力的一部分。

收在本书中的论文仅仅是小龙近百万字学术论著的一部分，但从中已可以看见小龙探索的足迹。在小龙学术探索的路上也曾有过风风雨雨。他的富有个性的反思、挑战与创新，使我国语言学界产生了震动；他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体系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考验。这使我想起了我们这一辈在五四时代经历的语文变革风云。中国语言学的世纪之交总是那么令人感慨！然而小龙这一代毕竟碰上了好时代。在

这个时代，全民族都有振奋探索创新的勇气。小龙这一代语言学青年一定能比前人更健全、更深刻、更成熟，因而也更多贡献。这正是我们作为前辈的最大期望与欣慰！

谨以此祝贺《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一书的出版，并向支持此书出版的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和汉字现代化研究会致以敬意。

目 录

· 文化反思篇 ·

1.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1)
2. 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 (30)
3. 论张世禄语言哲学的民族性…………… (43)
4. 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 (53)

· 结构篇 ·

5. 试论汉语动词、形容词的重迭形态…………… (66)
6. 论汉语句子的常态…………… (80)
7. 汉语动词分类角度…………… (155)
8. 《左传》形容词研究…………… (167)
9. 《左传》句法札记…………… (187)
10. 辨“转注”“假借”之为造字法…………… (200)
11. 汉语诗律的语言学考察…………… (213)

· 方法篇 ·

12. 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 (228)
13. 汉语语言类型的新探索…………… (243)
14. 论语言分析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257)
15. 试论深层结构理论的汉语化…………… (270)
16. 切韵的性质与古音研究的观点…………… (283)
17. 论汉语史的研究传统及其方法更新…………… (290)
18. 汉语研究的文化学方法…………… (306)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一个民族的维系有种种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该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而作为这种认同的主要表征，则是民族语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①语言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带头科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指导思想的经学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经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正是语言文字的考证和训释。当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也是阐释封建文化之“道”的利“器”——传统小学。在除旧布新、新旧纠缠的文化震荡之中，从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层也在历史地形成。这一断层在初具规模的三十年代曾引起语言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研讨。而在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潮水般涌入、著述蜂出之时，这一断裂立刻被义无反顾地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新层面，在它上面迅速搭起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恢宏的脚手架。由此产生的新的历史惯性竟使人们在半个世纪中汲汲于圆说西方语言理论概念体系，直至将汉语分析的一个个基本领域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以至于叹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时，仍无意对脚下的文化断层作出已经过迟的反省。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文化在与世界其他工业文明的文化的比较、冲突、交融中重新得到评价和检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汇的建树及其酸果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和“回甘”的机会。汉语语言学界正在意识到，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要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根据。而不是到西方的菩提树上去摘下一串现成的果子。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科学既是沉重的包袱，更是巨大的财富，离开了这个基础，中国现代语言学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文化断层之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深刻底蕴。

晚清维新派的语文宪章——《马氏文通》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马氏文通》一直被认为是奠定中国现代语法学体系和方法的开山祖。如果说在传统小学有深厚积累的音韵学上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因材料的明智和方法的“西化”而使汉语音韵研究别开生面，那么在此之前晚清人士马建忠在用西方眼光看来几乎是毫无建树的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移植来印欧语言的整座“葛朗玛”（语法）大厦，则是语言学文化断层的第一座丰碑，从此奠定了整个汉语语法发展的基本格局。正因为《马氏文通》在现代语文革新上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对它的剖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反省中国现代语言学降生的历史根源。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是一个与洋务派关系很深而又比较急进的改良主义者。他通晓法文和拉丁文，早年作为我国第一个到欧洲学习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到法国留学，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一些新知，回国后，他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名洋务干材。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紧尤其是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马建忠深感靠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获得中兴。他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和前提。这一见解使他成为早期维新派的知名人物。经济上富国先富民的思想，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改变“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①”的局面。显然，马建忠是把语文作为载“道”明理之“器用”来看待的。这同早期维新派“中

①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

体西用”的口号有深刻的联系。维新派的主将王韬在当时就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①主张以中学为“主”“体”，以西学为“辅”“用”。^②这种“形而上之为治平之本，形而下之即富强之术”的思想，在当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竖起维护“中体”的幡号，开了采纳西学之戒，它把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引起的“中西”这一对使封建士大夫十分敏感的矛盾范畴纳入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器”、“体”“用”的互相对待的框架内，以文化上的折衷论推行维新变法的政治准则，以致“举国以为至言。”^③然而“西”戒一开，西方物质文明蜂拥而入，西学的内涵也不断扩展。马建忠不仅积极主张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借外资以兴建铁路，开发矿藏，而且提出“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的口号，把西学的内涵由“末”延伸到“本”，显露出咄咄逼人的新的时代精神。一八七七年他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本在于“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也。”这就把“西用”的视野由物质文明直接拓向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这正是改良派区别于洋务派的革新抱负。马建忠正是怀着这种用“西体”改造“中体”政治文化抱负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成就中国语言学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的。在是书的序言中，马建忠痛斥传统的语文教学涉及文法之事“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者，未可以言传也”。他质问道：“噫戏！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他看到“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因而对语文教学是富民强国之本深以为

①王韬《杞忧生易言跋》载《弢园文录外编》

②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④马建忠《铁道论》，载《适可斋记言》卷一

然。马氏认为“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他因而断言中国落后愚昧的原因就在于“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以革新封建教育、政治制度为己任的马建忠把语言规律的揭示与否提到中西“贤愚优劣”之分的高度，其用心之处，正在于由“用”到“体”的反思。这一思想同严复的“中西古今”论如出一辙。实质上放弃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折衷观，而将中西文化放在人类共同发展历史阶段的两个低高不同的时代层次上，从中我们不难理解马建忠何以如此虔诚地模仿整个拉丁文法来构筑汉语语法体系。而且他相信世界各民族“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他又“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因而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①这种信念也导源于西方逻辑语法将现成的范畴套用于各民族语言而不问其本身结构特点的思潮。“以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的抱负同西方唯理普遍语法的认识相扣合，马建忠便“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征繁引以论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坚信“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②中国传统的虚字、句读释经之学就这样在具有时代责任感，自觉肩负起在思想文化领域披荆斩棘、拓荒播种任务的维新派手中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面目全非的西方语言理论体系。《马氏文通》成了改良主义者急功近利的语文宪章。“文化断层”就这样形成了。

①、②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

《马氏文通》出版以后，影响巨大。“一般人对于文法的认识是从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之后开始”。^①然而正因为它是文化断层上的产物，因而是书出版后二三十年中“‘亿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亿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②对《马氏文通》的西化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它的组织并不是中国语文上所显现的一切辞例收集汇类，组织起来的。彻头彻尾只是用了西洋语文的组织做筛子，把中国语文筛了一道，单检搁在筛子上的东西做材料组织起来的”。^③“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有绝异者数点。……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足适履，检格难通”。^④出路何在？“欲矫其弊，惟有从独立的研究下手”。^⑤赞成《马氏文通》的人却反唇相稽：“几千年年‘独立’的困难与流弊还不够使我们觉醒吗？我老实规劝那些高谈‘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⑥《马氏文通》的作者也针对批评意见说：“不学拉丁文法，就编不出这部文通来，恐怕至今还在虚字研究中摸索”。^⑦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改革中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的问题。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马氏文通》出版以后，人们一面批评《马氏文通》的模仿，一面却从《马氏文通》模仿印欧系诸语言的语法的立场上进一步后退，惟以英文语法为模范，使西化之风愈演愈烈。批评《马氏文通》十分激烈的陈承泽、杨树达等的语法著作虽各有特点，但“倘将《马氏文通》体系放在眼前，和各部书的体系比较对照，那这几部书立刻就会聚作一团，面貌非常相似，除出小小的几点外，几乎完全相同，一眼就

①、⑦、陈望道《“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载1938年《语文周刊》20、21、22期

② 转引自《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载1941年《复旦学报》复刊第一号

③、④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

⑤ 胡适《国语法概论》载《胡适文存》二集第三卷

⑥ 转引自《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朱星的文章

可以看出他们是至亲”。^①即使是企图对《马氏文通》全面修正的刘复，他的《中国文法通论》的研究方法仍是模仿斯威特的《新英语语法》。尤其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在最大程度上照搬英文语法，完全淹没了汉语的特点。反对西化的却又更深地陷入西化，这种历史的“悖论”在当时是无法解释的。然而从今天考察文化断层的新观察系来看，模仿和反模仿的共同历史悲剧是没有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语文现代化的支撑点，因而他们构筑的现代化大厦是先天不足的。三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有识之士曾指出：汉语的文法研究，并非始于《马氏文通》，而是在古代早已萌芽和生长，傅东华等人明确指出文法研究不专在西化，而“贵乎稽古”。古人的语法分析“知则必真知灼见”，“言则必信而有征”。^②这些话虽不无偏颇，但就当时形成的文化断层而言，则不啻金玉良言。遗憾的是这些意见都没有引起汲汲于“现代化”的语言学家的重视。

欧化文的大雅之堂——白话文运动

二三十年代，在“五四”反封建运动中新生的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充满了革命战斗的气氛。五四运动的时代要求冲破了我国语文研究几千年以汉字为枢纽，在文字、音韵、训诂上释经阐义的传统格局。晚清语文改革中以“白话文为维新之本”，要求言文一致，提倡新文体、切音字，推广民族共同语“官话”的思潮在“五四”时因反帝反封建的急需而激宕成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风气突变，不论教育性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白话文都成了‘正宗货’，又陆续出了大量的白话翻译品，吸收了许多外来语和欧化的造句法。新的语言形式和新的思想内容是互相伴随而来的”。^③白话文运动语文改革精神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维新派语文宪章的《马氏文通》“中西古今”“贤愚优劣”观的延续。它借助西学之

①同上页①

②傅东华《文法稽古篇》1939年《东方杂志》36卷20、21号

③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力冲垮了文言文的世袭地位，使白话文充斥着欧化词句登上大雅之堂，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这既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继《马氏文通》之后的又一巨大转折，也同时因剧烈的震荡造成新的断层。这种断层引起的民族语言心理的迷惘可以从当时在《民国日报》上刊登的一个问题讨论上十分逼真地看出来：

“现在的白话有两种：一种是纯粹欧法的。虽然合于文法，却是我们本国人看了它，常常的不懂。还有种是纯用中国法的，虽然好懂，却与那真正文法又有不合了。我这究竟应当谁与适从呢？”①

合于《马氏文通》式“西体中用”文法的白话，老百姓看不懂；老百姓看得懂的却又不合在当时已有“真正”地位的西式文法。这是继《马氏文通》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悖论”。欧化文造成的断层在当时中国语法学家的语法著作中已有鲜明的反映。王力《中国语法理论》把语法的欧化与生活的欧化同样看作当时不可遏止的潮流。但他很有见识地将“欧化的语法”与“中国现代的语法”断然分开，认为前者只是知识阶层的一种“特殊语法”，而且“只出现于文章里”。这种“特殊语法决不能代表大众的语言”。因此当时时髦的《白话文法》一类的书把二者杂糅起来，在他看来“是一桩极不合理的事”。《中国语法理论》就是在书末将“欧化的语法”专列一章以示中西之别的。俞敏先生在谈到白话文运动时曾幽默地指出：

“五四”时的作家多半通些外语。他们写“当××时，虽然用文言，还不违反我们的句法。什么时候他们连‘时’都去了，就是用了英语里带关联副词when的句法了。汉语的同位语中间原不加什么，有人写‘豆腐西施的杨二嫂’，他就是用日本语法来打乱汉语口语语法了，‘他有一个大鼻子’看似汉语，却非汉语。汉语只说‘他大鼻子’，而说‘一个人有鼻子’是废话，说‘有一个’是更没用的废话”。②

欧化文之所以能侵入汉语，除“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

①语见1923年3月9日《民国日报》

外，与汉语本身的语言特点不无联系。汉语的语词意蕴丰富有余，配合制约不足。一个个语词就象一个个基本粒子，可以随意碰撞。只要凑在一起就能“意合”，不搞形式主义。用西方语法的眼光看，汉语的句法控制能力极弱。只要语义条件充分，句法就会让步。这种特点使汉语的表达言简意赅、韵律生动，有可能更多地从语言艺术角度考虑。同时，这也使汉语语法具有极大的弹性，能够容忍对语义内容作不合理的句法编码。这就为欧化语法词汇的大量涌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受到欧化影响的汉语白话文，在趋向表述精密化、逻辑性强的同时，也损失了汉语表达的许多优点。欧化更给汉语语法研究设置了重重迷障。欧化文只能用欧化语法来解释。象王力先生那样把二者断然分开，只有在以《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和口语为材料的研究中才是可行的。事实上欧化文正反过来迫使语法偏离汉语的特点，走欧化分析的捷径。正如有些语言学者所说：“最可怜的是有些语法学家，他们连哪位作家、翻译家也得罪不起。他们的规律就剩下‘这也行，那也可以了’。”^②

针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这种流弊，陈望道先生还时就提出对欧化语体文的两个限制：“（1）须是原有（汉语）文法底扩张”，“（2）须是原有（汉语）文法底颠倒或离合”。两个条件的要义就是不要失去汉语的特点，“能够欧化而人仍能懂”。^④一九三四年陈望道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发动了著名的大众语运动，对当时吸收西方语法与词汇来写文章，造成一种“新文言”或“欧化文”的倾向提出批评。这是对白话文运动的一次修正。它对当时白话文因欧化而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进行了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当时在鲁迅支持下创办的半月刊《太白》，题旨就是“比白话还要白”的“大众语”。（这里的

②、③俞敏《白话文的兴起，过去和将来》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

④语见1921年6月16日《民国日报》

“白”显然指“中国现代口语化”)由此展开了一场语文论战。陈望道在论战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言文是反大众的;通俗的白话文是混大众的。二者都是站在大众之外,对于大众是外头人。只有“大众语”是大众的。他还指出,从内容上来看,“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上最繁复的时期。单纯地把这时期的白话捆成一束给它贴上标记,无论说它好说它坏,似乎都是不妥当的。他发人深省地问道:

“五四前后以‘革命’姿态出现的白话文为什么不久就堕落了?”对这个有深刻涵义的问题,陈望道认为值得细细检讨,以便对“白话”获得具体而正确的结论。^①可惜这种对文化断层的检讨并未深入广泛地展开。人们习惯了欧化文。后来的青年已很少能够辨别哪些语言形式是中国固有的,哪些是舶来品。

历史以它巨大的惯性前进着。今天人们已不再对欧化耿耿于怀了。欧化语文深入到汉语的血脉之中。它为半个多世纪来套用西方各种语法模式分析汉语的一代一代现代语言学者提供着完美的例证。再也不会有一本语法书象《中国语法理论》那样把“欧化的语法”入另册了。然而集中体现汉族人思维特点的汉语语法的固有精神又是不可磨灭的。欧化文能够遮盖它,却无法取代它。它依然活跃在大众口语中和文学戏剧语言中。它深深困扰着已习惯了西方分析模式的中国语法学家们,使汉语语法的词、词类、句子、主语、宾语等基本范畴历经几十年论争而无法获得科学合理的解释。具有权威性的句子分析“主谓二分法”,把汉语中无“主语”的句子赶入专为维持“主谓句”而设的垃圾箱:“无主句”,或“复句”。对汉语中多“主语”的句子中“多余”的“主语”则统统赶到“句外”,谓之“语用成分”,即非语法成分。(怎么知道这种非(西方)语法的成分就不是汉语特有的语法成分呢?!)以此来维护西式主谓二分句子理论的严肃性。同样具有权威性的句子分析“动词中心论”,认定汉语的句子同西方语言句子一样只能有一个核心

^①陈望道《大众语论》载《文学》月刊第3卷第2期

动词，句中各种成分都是以这个动词为中心明确彼此关系的。人们感到惊奇的是持论者竟对汉语中俯拾皆是的以时间为顺序大量集结动词，连续堆迭动词性词组的句子常态熟视无睹。当前中国语法学界流行的“层次分析法”、“成分分析法”，“变换分析法”尽管以欧化为依托说得头头是道，究其实质无一不是这种语言学之大忌——“强人政策”的产物，即不是从全面客观的事实立言，而是以欧化之势压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在五十年代关于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中，一位学者曾一语破的：“句分主谓，这个办法，连带它用的术语，都是西方语法里搬来的。就汉语说，这套办法和术语是否妥善（与客观情况的相应程度怎样，本身系统的调和程度怎么样，学习、使用的方便程度怎么样）也是大可以考虑的。这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时候只能不问。一问就有基础动摇的危险。以下的讨论是建筑在‘主语’这个术语是妥善的这个基础上”。^①这实际上是对因《马氏文通》以来欧化的语法理论和“五四”以来侵入汉语血脉的欧化文形成的“断层”持眼不见为净的“明智”态度。

如果说上述“自然的欧化”还可以令中国语法语界安于现状，那么近年来另一种“人为的欧化”已有使语法学界坐不住之势。一些研究者直接套用英语语法研究的成果来分析汉语，自造例句，将汉语语义对句法编码的忍耐力扩张到极端，成为一种扭曲变形，以洋腔洋调来证明某个洋规律适用于汉语。例如为了说明汉语出自一个间接问句的定语从句化或话题化是完全自由的，便造出“你想知道我向谁买的书在这儿”这种文理不顺、意义多歧的句子。这种用“拿来的”原则改造实际，强使实际就范的方法，对于从实际出原则的语言科学研究无异于一种本末倒置。它用人为的欧化文找到了一条比前人利用自然的欧化文更为便捷的西方化捷径。汉语语法研究已跟随西方亦步亦趋近百年。如果我们不仅在方法论上要照搬洋框框，而且在材料上要依赖洋腔洋调，这是十分可悲的。

^①问若《有关主语定义的一些问题》载《中国语文》1956年1月号

汉字的“泰西”归宿——拉丁化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引为自豪的大事之一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切字音”运动。这是中国首次出现的民族的汉语拼音运动。这场运动同清末的维新变法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第一个提出拼音化主张，研制出拼音方案，并以拼音读物形式出版的，是卢懋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卢懋章信奉基督教，长期从事英语和汉语的教学，深受教会罗马字的影响，立志改革汉字。他在《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阐述了他推行切字音的指导思想：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习理，其所以能好学习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可见，卢懋章的切字音与马建忠的文法学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语文现代化形式，但在鼓吹改良、改革教育、主张节约时间以掌握西方新知、进而振兴中国的大方向上是殊途同归的。如同“葛朗玛”在马建忠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卢懋章也认为切字音是西方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必“自异于万国”。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切字音运动虽然非难汉字，认为它“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但人们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主张“以切字音与汉字并列”，①“由切音以识汉文”，②以达到“不数月，通国家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无不识字”的目的。③在早期从事切字音的开明人士看来，拼音字只是汉人“读书时之补助品”，④是帮助识字、普及识字教育的工具。这无疑体现了维新派“中体西

①、③卢懋章《一目了然初阶》

②卢懋章《北京切音教科书》

④郑东湖《切字音说明书》